

教宗本篤十六世

爲慶祝

世界和平日 文告

2009 年 1 月 1 日

「對抗貧窮，締造和平」

1. 在這新一年的開始，謹在此再一次祝願所有人得享和平，同時透過我這文告，邀請大家一起反省以下的主題：「對抗貧窮，締造和平」。我可敬的前任若望保祿二世在 1993 年的世界和平日文告中已指出，當整個民族生活在貧困中時，即危害到和平。事實上，貧窮經常是引起衝突，包括武裝衝突，或使這些衝突惡化的其中一個原因。而這些衝突又再製造悲慘的貧窮境況。「我們的世界 — 若望保祿二世寫道 — 顯示出另一個影響和平的嚴重威脅正在增強：今日有很多人，或更好說，有整個的民族是在極度貧窮線下生活。就算在經濟最發達的國家，貧富懸殊的差距也越來越大。這是個人類良知不能忽視的問題，因為當爲數眾多的人生活在一個對人本身的尊嚴是種侮辱的環境中時，結果是全世界真正及和諧的發展便受到威脅」。¹

2. 在此背境下，對抗貧窮要求要特別關注全球化這複雜現象。從方法學的觀點看，這關注非常重要，因為它提醒人要利用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對貧窮那許多

¹ 《世界和平日文告 *Messaggio per la Giornata Mondiale della Pace*》第 1 號。

不同層面所作的研究成果。另外，重新提及全球化，也應該促使我們留心這問題本身附帶著的倫理和靈性意義，提醒我們當接觸窮人時，要清楚地意識到，我們所有人都是天主那獨一的計劃的參與者：即是我們都被召叫建設那個唯一的家庭，在這家庭內所有人 — 個人，民族和國家 — 均以兄弟情誼和承擔責任為原則，規範各自的行為。

這期許亦要求應該對貧窮有一個宏觀和清晰的視野。設若貧窮純粹是物質方面，那麼一般社會科學特別對各種現象而作的數據上的研究，應該足以顯示出貧窮的主要特性。可是，我們知道，實際上存在著並非因為物資缺乏而引起的非物質性貧窮。例如在富裕和進步的社會中，存在著將人邊緣化的現象，和人際關係，倫理及靈性上的匱乏：這可以從一些內心生活錯亂，及雖然經濟條件優裕，卻生活在不同型式的困擾中的人身上見得到。我認為，這一方面是由於一般所稱的「倫理發展不足」² 與另一方面，「發展過度」³ 帶來的不良後果。我亦無法忘記，在一些被稱為「貧窮」的社會中，他們的經濟增長，經常因為文化方面的阻撓而停頓，以致無法適當地利用所擁有的資源。然而，無論如何，任何一種由外來因素造成的貧窮，其根源都是因為缺乏對天主賦予個人的尊嚴的尊重。當我們不再整體地從人的天職看人，也不再尊重真正的「人類環保」⁴ 的要求時，貧窮的可怕威力便爆發，一如在某些特別領域內清楚顯示的，我會在下面簡略地逐一談談。

貧窮與倫理含義

3. 貧窮通常總是與「人口增加」相提並論，視「人口增加」為造成貧窮的真正原因。其結果是國際性推行降低出生率的宣傳，和不惜採取既不尊重女性，復不尊

² 保祿六世，《民族發展 *Populorum progressio*》通諭，第 19 號

³ 若望保祿二世，《社會事務關懷 *Sollicitudo rei socialis*》通諭，第 28 號。

⁴ 若望保祿二世，《第一百年 *Centesimus annus*》通諭，第 38 號。

重夫婦有責任地選擇子女數目的權利，⁵ 而且經常出現更嚴重的情況，不尊重生存的權利，以抗貧為名，殺害數以百萬計的未生兒，這基本上是在滅絕人類中最貧窮的一群。然而真實的情況是，1981 年全球人口中大約有百份之四十在絕對貧窮線下生活，今日這百份比實際上減了一半，而那些得以脫貧的民族都有一個特點，他們的人口都顯著地增加了。這現象表示，甚至在人口增加的情況下，仍然有資源解決貧窮問題。另外也不要忘記，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現在，世界人口增加了四十億，主要原因是由於有某些國家在近期以新經濟勢力出現於國際舞台上，他們之所以能夠發展得這麼迅速，主要基於他們擁有數目龐大的人口。還有，在那些高度發展的國家中，有高出生率的，都擁有更好的發展潛在力。易言之，這證明人口與貧窮無關，人口並非引致貧窮的因素。

4. 另一個使人憂慮的領域是有關大流行的瘟疫帶來的疾病，例如瘧疾，結核病和愛滋病，由於一般受到這些疾病打擊的，是人口中從事生產的一群，這使到有關國家的經濟情況每況愈下。而設法消除這些疾病在有關民族中帶來的後果的嘗試，並非常見成效。事實上，有時候出現的情況是，該等受到某些大流行的瘟疫的疾病打擊的國家，爲了要應付局勢，被迫接受那些給予經濟援助者的條件，施行違反生命的政策。而尤其困難的是對抗愛滋病，這個引起貧窮的主因，除非在對抗這疾病的同時，也灌輸跟這病毒的撒播有關的倫理問題。首要的是從教育方面作宣傳，將完全合符個人尊嚴的性愛知識灌輸給青年，初步在這方面所作的工作已見到重要成果，減低了愛滋病的撒播。接著是藥物和護理，一定要讓那些貧窮的人民也能得到所需的照顧；這一切假設須要下決心推行藥物的研究及治療學

⁵ 參看保祿六世，《民族發展 *Populorum progressio*》通諭，第 37 號；若望保祿二世，《社會事務關懷 *Sollicitudo rei socialis*》通諭，第 25 號。

上的改良，並且，在有需要時，應該彈性處理保護知識產權的國際規則，以保證所有人民都可以得到基本的健康照顧。

5. 在對抗貧窮的計劃中要注意的第三個領域，同樣呈現其內在的倫理層面，此處所指的是「兒童的貧窮」。當一個家庭受到貧窮的打擊時，最大的受害者總是兒童：今日生活在絕對貧窮的情況中的人口，幾乎超過半數是兒童。因此從兒童的立場著眼，對抗貧窮表示要優先考慮那些直接影響他們的目標，例如對母親的照顧，對教育的承諾，接受注射疫苗的機會，醫藥護理及清潔的食水，環境保護，尤其是，維護家庭及家庭中人際關係的穩定的承諾。當家庭被削弱，所帶來的遺害無可避免地總是由兒童來承受。在婦女和母親的尊嚴不受到保護的地方，最受影響的主要仍然是兒童。

6. 從倫理觀點而言，第四個值得特別注意的領域是「裁軍與發展的關係」。目前全球軍費的水平令我們不得不憂慮。即如我曾指出的，有時「那些原本應該用在為人民，特別是為那些最貧窮和最需要救助的人身上的發展計劃，的龐大物資和人力資源，都用到軍費開支和武器採購上。這與聯合國憲章上所寫的最好相反，這憲章要求國際團體，特別是所有國家，要他們『以世界人口和經濟資源的最低消耗作軍備，以促進穩定和維護國際性的和平與安全』(第 26 條)。」⁶

⁶ 本篤十六世，致馬天樂樞機(Cardinale Renato Raffaele Martino)書函為宗座正義和平議會主辦的國際研討會《裁軍，發展與和平。對全面裁軍的期許 *Disarmo, sviluppo e pace. Prospettive per un*

這種情況非但無法促進，而且是嚴重地阻礙了國際團體一些重要發展項目的完成。尤其甚者，過度增加軍費會引發軍備競賽的危險，及帶來眾多的發展不足和絕望，因而似非而是地，過度增加軍費反而成為不穩定，緊張和衝突的原因。就如我可敬的前任睿智地觀察到的，「發展是和平的新名稱」。⁷ 為此謹呼籲各國，要嚴肅地思考各種衝突的最深層原因，這些衝突很多時都是由不義所引起，因此呼籲大家要勇敢地自我檢討。設若各國之間的關係能夠改善，這表示削減軍費的可能性其實存在。這樣便可以把省下來的資源，用在最貧窮和最需要救助的個人和人民的發展計劃上：這種花費，是爲了整個人類家庭內的和平而作的花費。

7. 對抗物質上的貧窮的第五個相關聯的領域，是有關目前的食物短缺，這食物短缺使到那些缺乏最基本需要的人陷於絕境。而特別之處，是這短缺並非出於食物不足，而是出於無法獲得食物和不同型式的投機，換句話說，是政治和經濟組織之間，欠缺了應付需要及緊急情況的協調。再者，奪取了很多入藉以脫離貧窮境況必需的力量，而不給予特別援助造成的營養不良，有可能給一些人民帶來身心方面嚴重的創傷，亦正是這一點擴大了不平等的歧異，並誘發可能演變成暴力的反抗。最近這幾十年，所有與貧窮有關的指數，都顯示出貧富懸殊的差距正在不斷上升。毫無疑問，做成這現象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由於科技的進步，這使到高收入的一群成為受惠者，另一方面，是工業產品價錢的調整，這些產品價錢的調升，比貧窮國家所擁有的農產品和原材料的價格都快得多。在這種情況下，生活在貧窮國家的大部份人民，由於低收入和高物價，承受著被雙重邊緣化。

disarmo integrale》2008 年 4 月 10 日：《羅馬觀察報 *L'Osservatore Romano*》，2008 年 4 月 13 日第 8 版。

⁷ 《民族發展 *Populorum progressio*》通諭，第 87 號。

8. 締造和平的其中一條主要途徑，是一個以人類大家庭的利益為目標的全球化。⁸ 然而，為了能夠將全球化控制得宜，在富國與窮國之間，和在各國的內部，包括富裕國家在內，一定要有一個堅固的全球性團結。⁹ 需要有一「共同的倫理律例」，¹⁰ 其中的規則不單只是基於大家所協定的，而是以造物主刻在每一個人類良心上的自然律為基礎（參看羅 2:14-15）。在我們每一個人的良心深處，豈不是都感到有一聲音在呼籲我們，要對公益事業和社會上的和平作出貢獻嗎？全球化固然拆除了某些藩籬，可是這不代表它不會築起新的；全球化使民族與民族之間更接近，然而時空上的接近，本身並不能創造出有利於真實共融及真正和平的條件。只有當每一人因為今日世界上的不義，和由於這些不義而引致人權受到鎮壓，因而真的覺得自身受到傷害，那時地球上那些被邊緣化的窮人，才可以找到有效的救援工具。為了戰勝不義和誤解，以建設一個更和平與更團結的世界，教會，作為「與天主親密結合，以及全人類彼此團結的記號和工具」，¹¹ 會繼續作出她的貢獻。

9. 今日在國際商業界和財經界，正進行著相互關聯的一系列活動，令到經濟得以有一個正面的整合，從而使一般的情況得到改善；可是，亦有一系列走向相反方向的活動，令到各民族分裂並邊緣化他們，替戰爭和衝突製造危險的導火線。緊接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那幾十年，貨物和設施的交易在國際貿易中以異常的速度增長，其活躍程度是史無前例。而這些全球性貿易涉及的，主要是那些老早已進行工業化的國家，及為數可觀的新興的，剛踏上世界舞台的國家。可是尚

⁸ 參看若望保祿二世，《第一百年 *Centesimus annus*》通諭，第 58 號。

⁹ 參看若望保祿二世，公開接見義大利工人基督徒協會的《講話》，2002 年 4 月 27 日，第 4 號：《若望保祿二世的教導 *Insegnamenti di Giovanni Paolo II*》，XXV, 1 [2002]，637。

¹⁰ 若望保祿二世，對宗座社會科學院全體大會的《講話》2001 年 4 月 27 日，第 4 號：《若望保祿二世的教導 *Insegnamenti di Giovanni Paolo II*》，XXIV, 1 [2001]，802。

¹¹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教會 *Lumen gentium*》憲章，第 1 號。

有其他低收入的國家，在貿易方面仍然嚴重地被邊緣化。由於最近這幾十年，幾乎構成他們全部出口總值的原材料的價格急速下降，以致影響他們的經濟增長。這情況令到在這些國家內，其中大部份在非洲，對原材料出口的依賴，繼續成為爆發危機的潛在因素。謹在此再次重申我的呼籲，希望大家避免使用排斥和邊緣化的手段，好讓所有國家，都可以獲得進入世界市場的平等機會。

10. 相同的反省也適用於涉及全球化現象中的一個重要範疇，即金融界，這要多得科技的發達，和各國容許貨幣自由流通的政策。金融界最重要的客觀功能，是支持長線投資，亦即是支持長遠的發展，的可能性。然而，這功能今日已顯得相當脆弱：這功能正受到來自本國和全球性的一種財經交易方式的負面影響。為了追求金融活動的增值，這方式以短線考慮為原則，而專門於不同型式的風險中作技術性操控。包括最近的金融危機，正好顯示出金融活動有時是由一些純粹只顧自身利益的邏輯所帶領，完全缺乏對公眾利益的長遠考慮。全球金融界降低目標只作極短線的考慮，會同時削弱金融界發揮它作為現在與未來的橋樑這作用的能力，和長遠支持創造新的生產和新的就業機會的能力。一種只限於作短線和極短線投資的金融活動，對所有人都是一件危險的事，包括那些在金融市場好景時，成功取得利益者。¹²

11. 綜上所述，可以見到對貧窮的抗爭需要在經濟層面和法律層面上互相合作，以容許國際團體，尤其是容許那些貧窮國家找出大家接受的解決方法，並將這些方法付諸實行，以便應付前面提及的問題，同時藉此為經濟制定一個有效的法律構架。此外，也需要鼓勵建立有效率和願意承擔的機構，還有的是打擊犯罪組織及培養一個守法的文化。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認，那些過於著重救援的政策，是

¹² 參看宗座正義和平議會，《教會社會訓導綱要 *Compendio della dottrina sociale della Chiesa*》，368。

使到很多對貧窮國家的扶貧工作失敗的原因。以目前的情況，作為中期與長遠的目標，將資源投資在人民的培育，及發展一個專門和整體性的企業文化，應該是最正確的做法。若經濟活動需要一個有利的環境以便發展，這並不代表便無需關注國家的歲入。雖然要指出，「人均收入」(*pro capite*) 絕對不該成為政治經濟行動之目的，然而也不可忘記，「人均收入」代表著達到對饑餓和絕對貧窮的抗爭這目標，的一個重要工具。因此，那些幻想著只要將現存的財富再行分配，便可以從此將貧窮問題徹底解決的政策，可以束之高閣。在現代的經濟中，財富的收入，絕對視乎目前和未來，國家的歲入的增長能力。因此，創造財富，成為一個躲避不了的責任，只是要注意，是否也願意對物質性的貧窮，作有效和持久的對抗。

12. 最後，將窮人置於首位，表示那些活躍於國際市場的人士，應該以正確手法從事交易，而政界中擔任公職者，則要以正確方式處事，至於所有屬於某一種政體的人民，應該具有正確的合作精神，懂得利用本地和國際性的民間社會所作的貢獻。這些同一的國際機關今日都承認，區域性和國際性的民間社會為了救援人口中經常生活在極度貧窮情況中，而官方的救助很多時又無法到達的一群，將他們納入社會，而開始的一些經濟規劃的價值及優點。二十世紀的經濟發展也教導我們，良好的發展政策，實有賴於人對責任的承擔，以及在市場，民間社會與各國之間創造一個正面的伙伴關係。由於發展在本質上是個文化現象，而文化則是

在民間產生和成長。¹³ 因此，對發展中的每一個過程，民間社會特別擔當著一個關鍵性的角色。

13. 正如我可敬的前任若望保祿二世曾指稱的，全球化「帶著明顯的矛盾性」，¹⁴ 因此需要謹慎睿智地管理。這睿智包括優先關注地球上窮人的需要，克服存在於貧窮問題及人預先安排用來解決這些問題的尺度，這兩者之間的不均衡招來的物議。這不均衡涉及文化和政治方面，以及靈性與倫理方面。事實上，很多時候，我們都只是停留在貧窮的表面和工具性因由，而沒有深入探究那些盤踞於人類心中的原因，例如貪婪和視野狹隘。以致有時在處理關於發展，救援和國際間的合作等問題時，沒有認真地以個人作考慮，只是當技術性問題來處理，只限於建立構架，貿易協定，和不具名經費的撥付。可是對貧窮的抗爭，卻需要一些深入地過著兄友弟恭的生活的男女，他們才懂得應該如何陪伴著個人，家庭和團體，實現真正的人性發展。

結論

14. 在《第一百年 *Centesimus annus*》這通諭中，若望保祿二世訓誡大家需要「摒棄視窮人，個人和民族，為麻煩的包袱這思想，認為他們只想享受別人的生產成果」。「窮人 — 他寫道 — 要求的，是物質上的分享及工作上的分擔，藉此給所有人帶來一個更公義和更繁榮的世界」。¹⁵ 在今日這個全球化的世界中，越來越明顯地見到，只有當全部人都獲得保證有合理成長的機會，才有可能締造和平。所有人，遲早都要對因為不合理的制度所造成的傷害負上責任。因此，將華廈建

¹³ 參看《同上》，356。

¹⁴ 公開接見勞工界和商界的工會領袖的《講話》，2000年5月2日，第3號：《若望保祿二世的教導 *Insegnamenti di Giovanni Paolo II*》，XXIII, 1 [2000]，726。

¹⁵ 第28號。

在荒野或廢墟中，是件愚蠢的事。單靠全球化並不能締造和平，在很多情況下，全球化甚至製造分裂和衝突。然而全球化也顯示出一種需要：為謀求個人和全體的利益，建立一個深入的團結的需要。如此一來，在對貧窮的抗爭，和為正義與和平儲備在這之前無法想像的資源一事上，全球化成為實行某些重要事項的契機。

15. 一直以來，教會的社會訓導都非常關注窮人，在《新事物》通諭的年代，這些窮人主要由新興的工業社會的工人組成；在庇護十一世，庇護十二世，若望二十三世，保祿六世及若望保祿二世等的社會訓導中，由於社會問題的範圍逐漸擴大，新型的貧窮也開始浮現，以至最終成為世界性現象。¹⁶ 對於這個擴大至全球性的社會問題，不應只關注數據上的增添，也要對人和人類家庭的所需，在素質方面作深入的探究。為此，教會在留心全球化目前的現象，和這些現象給人類的貧窮造成的嚴重影響之際，也同時分別從廣度和深度這兩方面，指出社會問題的一些新情況，因為它們牽涉到人的身份及他與天主的關係。此處所指的是教會的社會訓導原則，這些原則是為了澄清貧窮與全球化的關係，及帶領走向締造和平的行動。在這些原則中，其中要特別提及的，是根據愛德為首而「對窮人的特別關愛」，¹⁷ 自初生的教會開始(參看宗 4:32-36; 格前 16:1; 格後 8-9; 迦 2:10)，整個基督徒傳統，都曾為這特別的關愛作了見證。

¹⁶ 參看保祿六世，〈民族發展 *Populorum progressio*〉通諭，第 3 號。

¹⁷ 若望保祿二世，〈社會事務關懷 *Sollicitudo rei socialis*〉通諭，第 42 號; 參看同上，〈第一百年 *Centesimus annus*〉通諭，第 57 號。

「各人毫不拖延地做好自己應做的一份」，教宗良十三世於 1891 年這樣寫下，並繼續說道：「至於教會，不論在任何情況下，她永遠都不會疏忽了自己的職責」。¹⁸ 今天教會仍然懷著這精神從事她對窮人的工作，在他們身上，她看到基督，¹⁹ 她在心中不斷再聽到這位和平之王當日吩咐宗徒的話：「你們給他們吃的罷 — *Vos date illis manducare*」(路 9:13)。因此，忠於她的主對她所作的邀請，基督徒團體永遠都不會忽略了向整個人類家庭保證，她對推動創意團結的支持，不但是爲了把過剩的拿出來，而尤其爲了改變「生活的方式，生產與消費的模式，及那些今日治理著社會，以權力鞏固著，的組織」。²⁰ 因此在這新的一年開始之際，我謹向每一個基督的門徒及每一個懷著善意的人發出熱誠的邀請，呼籲他們爲了窮人的需要擴展他們的心胸，在可能範圍內向他們伸出援手。「對抗貧窮即是締造和平」這公理，事實上，永遠都無可爭辯。

發自梵蒂岡，2008年12月8日。

本篤十六世

¹⁸ 《新事物 *Rerum novarum*》通諭，第 45 號。

¹⁹ 參看若望保祿二世，《第一百年 *Centesimus annus*》通諭，第 58 號。

²⁰ 《同上》。